

臺灣國族認同的連續或斷裂？

評《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

吳彥明**

一、本書研究課題

關於臺灣國族主義／認同的相關研究在近十幾年來，呈現的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景況。這不僅顯示了臺灣政治民主化以及政黨輪替之後的歷史意涵，更重要的是，此一研究也呈現了一種跨學科式的知識形構，無論是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以及文學相關學科都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著述。因此有此一說，在臺灣，國族主義／認同的研究議題已經研究耗盡了（exhausted），再也無法提供一種另類的歷史詮釋架構了。然而，陳翠蓮教授的這本新書則是以一套整合的理論觀點，以及詳實的歷史素材，試圖向讀者論證過往對於臺灣國族主義研究的不足與缺失。

本書的問題意識在一開始就點了出來：「從日治到戰後，臺灣人一再反抗，他們在想什麼？他們要什麼？」，主要的關懷對象是臺灣當時的政治社會運動以及國族認同問題。而採用的分析策略主要可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認為「國族是指一個政治與文化的共同體」，¹ 其次是將討論的重點聚焦在「臺灣人在日治時

* 本文乃出自於謝國雄教授於清華大學社會所開設的「書評寫作」課程，本文作者非常感謝謝國雄教授對於本文的修改與建議，以及課堂同學的回應與指正。當然，文責自當由本文作者自負。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來稿日期：2009年2月20日；通過刊登：2009年5月11日。

¹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3。

期與戰後初期的反殖民抵抗行動」。² 整合來看，作者在此書所欲處理的是臺灣人在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當中的政治／文化抵抗行動，以及由當中所顯露的國族認同。此書所收錄的論文，乃是基於以上的架構所進行的。

本書除了導論之外，共有七章，依時間演進大致又可一分為二：日治中期以及戰爭／戰後時期。第二章探討了 1920 年代以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的自治主義路線政治運動，以及其中所揭櫫的政治訴求與理念，但此運動受日本大正民主影響甚深，因此臺灣人的自我形象也受到統治者所建構的殖民論述所圍限，造成此一抵抗路線終有難以突破的困境。第三章以《臺灣民報》的相關報導來分析臺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分裂前，知識份子對於臺灣文化的想像與建構，不過此一文化運動限於語文工具的選擇問題以及偏向菁英主義，因此與傳統文人與普羅大眾造成了緊張關係。第四章則試圖論證文化協會與臺灣農民運動之間並沒有存在著必然的關係，農民運動的發展並非受惠於知識菁英的介入與指導，而是依據自身理性的邏輯而行動，並保有高度的自主性。第五章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與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進行分析，說明了臺灣人始終懷抱著祖國情懷。

第六章透過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三位不同世代的個人日記，檢視戰爭體制下的臺灣人是如何在生活中進行抉擇以及其國族認同的變化，這當中顯示了在戰爭的不同時間點產生了反覆的認同狀態。第七章以留日臺灣菁英所組成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創立經過，呈現戰後初期臺灣人積極建設臺灣的熱情，以及之後所遭受到的政治打壓。第八章則透過戰後初期的官方作為與民間期望進行對比，呈現中國統治下臺灣的政治從屬化與文化污名化的再殖民現象，並推導出二二八事件並非是一偶發意外，而是與日治以來的反殖民抵抗經驗有著歷史性的關連。

二、本書論證與貢獻

臺灣目前對於國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兩個陣營。一個

²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25。

陣營持的是「延續說」，認為臺灣國族主義的起源是始於日據時期的 1920 至 1930 年代左右，並且對於臺灣目前興盛的國族認同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這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吳叡人。³ 而另一派則是持否定的觀點，例如方孝謙⁴ 與李筱峯⁵ 都認為這時期的臺灣國族認同其實是非常不確定與朦朧不清的，夾雜了中華民族認同、日本國家認同與臺灣民族認同。吳密察⁶ 甚至認為這是一個臺灣國族認同的「失敗經驗」。

上述的分歧主要是因為對於國族主義的概念建構有所不同而造成，主要的定義分歧就在於國族主義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抑或「政治上的國族主義」；除此之外，相當關鍵的是，這些研究經常將爭論的焦點聚焦在日治中後期，而忽略了戰後初期的歷史事件在臺灣國族主義形成的歷史意涵。而此書的貢獻便在於將反殖民抵抗與國族認同放在「西洋－日本－臺灣－中國」這樣的多重關係與脈絡下檢視其認同與抵抗的複雜交錯，並在這樣的架構上將歷史區段拉長，試圖論證臺灣在 1920 至 1950 年代當中「混雜的想像的共同體」與「政治上的國族主義」之間的**歷史連續性關係**。

本書作者認為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大約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⁷ 作者借用了 Anthony Smith 的理論觀點，認為知識份子的國族想像事實上都受限於過去的政治或族群的特性，國族的出現是有力的政治單位與共同體的交互作用，因此不能輕忽過去且持續的族群與政治的重要性。⁸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細緻來看則是，1920 年代臺灣已形成明確的「臺灣人共同體想像」，亦即一種臺灣的「原型國族主義」，但這個共同體或原型國族

³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43-110；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 2（2006 年 6 月），頁 127-218。

⁴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⁵ 李筱峯，〈一百年來臺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收於張炎憲等編，《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頁 275-301。

⁶ 吳密察，〈臺灣國家認同之歷史回顧－日本時代：一個失敗的經驗〉，收於施正鋒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06），頁 161-169。

⁷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18。

⁸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23，註 17。

主義的範圍與中國曖昧相疊，而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為止，所謂的臺灣國族主義終究未能明確成形。⁹ 但在面對國民黨政府於戰後接收臺灣所造成一系列文化、政治與經濟的打壓或榨取，臺灣民眾被迫逐漸體悟到自己受日治統治五十年後已然非漢非和的混雜文化，並開始透過對日治遺產的重新評價，主張擷取日治經驗中的優良成分，並節選中國與英美各國國家可資學習的優點，作為助長臺灣文化茁壯的養分。這時文化上的國族主義其實就如同作者在書中所指出的，與 1920 年代政治／文化運動者的主張有歷史上的再次合流。¹⁰ 最後，在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從這個時刻開始，臺灣人才開始徹底覺悟必須獨立自主，因此政治意義上的臺灣國族主義便正式出現了。¹¹

三、討論與切磋

本文將指出，陳翠蓮將方孝謙、荊子馨與吳叡人作為三個主要的對話對象有些失之偏頗，其實她與這幾位作者的論點是相近的。之所以挑戰此書不過兩頁半篇幅的目的相當清楚，這並不是刻意雞蛋裡挑骨頭，而是陳翠蓮與這三位學者的對話影響了她在本書之後的論證方式，因此有相當的必要去加以質疑。在這部份中，她的論證犯了兩個問題：首先，她是以「後見之明」來反駁這三位學者的論證，而忽略了這三位學者在著作中都有清楚地針對研究對象、範圍與解釋力作了清楚地說明；其次是簡化歷史進程的複雜性，本書很明顯地預設了在戰後初期以及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臺灣國族主義也隨之形成了，而忽略了在威權時期過渡到民主化階段這當中臺灣國族主義的再形構化與結晶化，甚至，現今臺灣國族主義的內涵仍是相當不明確。並且，似乎也預設了所謂「政治上的臺灣國族主義」就等同於「臺灣獨立建國」的訴求。

首先針對方孝謙的著作來看。她做了簡短的回應：「但，若不是日治中期以來臺灣人就形成了的集體認同，並有一定的定義範圍與想像內容，何以能夠在戰

⁹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30。

¹⁰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373、384。

¹¹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386。

後初期極短的時間內驟然形成、迅速凝聚全島性的反抗意識？」、「又，如果一個群體被殖民統治半個世紀所造成的影響並不重要，還有什麼更重要的？」。¹² 在此，分析者要注意論證用字的精確性，戰後初期真的有「迅速凝聚全島性的反抗意識」嗎？這當中的「迅速」、「凝聚」、「全島性」與「反抗意識」都定義不清，甚至會同質化許多不同的反抗意識，將之與日治中期的集體認同嫁接在一起；並且，就如陳翠蓮的論證，日治中後期的集體認同其實是相當紛雜的，因此陳翠蓮的這段話是用一個定義不清的論證來批評另一個她認為不明確的論證。除此之外，方孝謙所謂的「並不影響」，並不是說這段殖民歷史與現今臺灣國族認同之間真的那麼毫無關係，而是意指並非存在著演化論所預設本質上的「歷史連續性」，他並沒有否認知識份子再建構歷史的可能性。

其次，她相當簡短地批評了荊子馨在書中所欲暗示或明示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集體心靈已經被改造為「成為日本人」，因此她就以戰後初期的歷史來反駁這樣的觀點。然而，很明顯地她是去脈絡式地引用了荊子馨的論點，荊子馨原文中討論的是日本殖民論述對於皇民化與同化之間矛盾的「轉化與限制」，¹³ 陳翠蓮省略了「限制」而偏好「轉化」，會讓讀者誤認荊子馨就是要論證臺灣人「已成為了日本人」的事實。但荊子馨所謂的「集體焦慮與政治慾望」本身而言就是一種認同掙扎，絲毫沒有預設臺灣人已被徹底的轉化。書名《成為「日本人」》中的日本人是運用了引號來加以強調其歷史的偶然性與曖昧性；¹⁴ 更重要的是，荊子馨反轉了「皇民化造成臺灣人的認同掙扎」此命題，認為認同掙扎反倒是皇民化的前因。因此，臺灣人並沒有真正變成日本人，而是在日本戰爭後期所建立的弱勢霸權下，促使了矛盾錯置的日本人認同鑲嵌在臺灣國族認同的系譜之中。這反而與陳翠蓮在第六章的論證是接近的。

最後，她對於吳叡人的論證也是過度詮釋，她先引用了吳叡人的論證：「這兩個先後出現的論述：臺灣人擁有自決權與國家主權的政治民族主義，與臺灣民

¹²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17。

¹³ 見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81。

¹⁴ 參見柯裕棻與荊子馨的訪談紀錄。柯裕棻，〈去殖民與認同政治：訪談《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思想》2（2006年7月），頁 255-267。

族文化的文化民族主義，共同構成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出現的現代臺灣民族主義的內容」，¹⁵ 但她緊接著以去脈絡式的方式直接將這樣的觀點歸結為「臺灣民族已然形成」。¹⁶ 然而，作為一種論述的民族主義，儘管形成了，但不代表民族就水到渠成，或甚至預設民族主義就是臺灣獨立建國，因為這根本不是吳叡人那兩篇文章的問題意識。所以陳翠蓮逕自以無法銜接戰後歷史的發展來質疑吳叡人的論點，這點是有待考量的。畢竟吳叡人分別在她所引用的兩篇文章的最後一段都透露與她相同的觀點：

在戰後中國國民黨少數統治下，臺灣人的主體性鬥爭卻又重新浮出歷史舞臺，而昔日的「敗者」們未反抗日本殖民主義而苦心建構的臺灣文化論述，也在這場新的主體性鬥爭中，**被賦予新的生命**。¹⁷

而對「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個**陳舊夢想的記憶**，則在許多戰後的臺灣民主運動者腦海中翻騰湧動著，鼓舞他們在中國國民黨統治的新歷史現實當中，繼續追尋民主、自由，以及屬於臺灣人的「想像共同體」。¹⁸

因此本文作者比較好奇的是，陳翠蓮質疑了方孝謙、荊子馨與吳叡人的歷史詮釋無法與戰後初期歷史順利銜接，甚至與戰後初期的政治現象發生矛盾，或與歷史事實明顯斷裂，使得三位研究者的解釋力大打折扣。¹⁹ 但同樣的，如果運用同樣的邏輯來看，將陳翠蓮與蕭阿勤一系列對於臺灣國族認同在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研究作一對比，是否也會產生與她批評前三位作者同樣的困境呢？這個對比是相當重要的，而不是拾人牙慧的批評。因為這兩位學者對於國族主義／認同的解釋觀點幾乎可以說是相同的，例如陳翠蓮在第一章引用了 Smith 的理論觀點，認為國族主義者的任務與其說是發明傳統或國族，不如說是在諸多歷史選項

¹⁵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17-18。

¹⁶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18。

¹⁷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頁 216。強調部分為本文所加，以下均同。

¹⁸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頁 102。

¹⁹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18。

中選擇，並重新組合重新詮釋其神話、象徵、記憶與傳統。²⁰ 同樣的，蕭阿勤²¹ 也受到 Smith 的影響，認為國族認同經常是一種發生在知識份子的回溯式再建構。只不過蕭阿勤將觸發國族認同重要的歷史事件定位在釣魚台事件、喪失聯合國席次以及美麗島事件等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歷史動態進程中，但陳翠蓮在此卻犯了兩個層次的歷史演化論的問題，而這都出現在書中最重要最後一章。

首先是在最後一章處理二二八事件與臺灣國族主義之間歷史連續性的部份不夠細緻，只在書中的最後幾段文字中處理了：在二二八事件血腥鎮壓之後，「對部分人而言白色祖國已不可恃，轉而期待紅色祖國；更有臺灣人對中國的最後一絲希望完全破滅，徹底覺悟必須自主獨立；至此，具有政治意義的臺灣國族主義與焉形成」。²² 這句結論明確地告訴我們臺灣國族主義確立於二二八事件之後，但其內涵卻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並且這當中的歷史進程好似不證自明。除此之外，她在第一章的代結語中提到，在戰後初期的抵抗中，臺灣人深刻體認到外來政權的不可仰仗，終於覺悟到非得依靠己力不可，臺灣國族主義方始形成。²³ 而她在名詞定義時是這樣說到的：「對於這樣在文化上標舉自己的特性，並在政治上要求自我統治的共同體情感與選擇，即是國族認同」。²⁴ 不過，文化上的與政治上兩者間的歷史互動關係她卻沒有再多做著墨，似乎預示了，只要在歷史進程中出現這兩者，國族認同就出現了。因此，作者僅以戰後初期五年²⁵ 的分析區段就直接推論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與確立是有點不足的，嚴格來說這只能論證日治中期與戰後初期有所謂的歷史延續性，但她所提供的史料仍不足以可以論斷二二八事件對於臺灣國族主義有起**關鍵性**的作用力。

其次，我們可以從她書中的最後一段話來剖析：

²⁰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23。

²¹ 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1999 年 7 月），頁 1-51；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²²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385-386。

²³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32。

²⁴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 24。

²⁵ 相形之下，針對 1920 年代至 1945 年之間的分析篇幅就佔了二至六章，戰後的部份只於第七、八章中呈現，並且，第七章並沒有突顯出「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的面向，而第八章討論陳儀政府與二二八事件的部份又與許多現有研究相似。

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後，黨內政治環境更趨嚴酷，有關臺灣獨立主張被強力壓制，獨立運動只能在海外展開。儘管如此，自主獨立意識經過長期蟄伏，仍然汨汨不絕；直到九〇年代民主化之後的臺灣，終於能夠公開主張，並逐漸匯成巨流。²⁶

陳翠蓮在這段話之前花了相當多的篇幅論證了臺灣國族認同轉變與抵抗的過程，但卻迅速地嫁接到臺灣民主化後的發展，這當中也省略了將近四十年的歷史演進；並且，所謂臺灣獨立主張的「巨流」究竟意指為何？是「主流」？抑或臺灣社會當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國族認同主張（政治效應上）？這都與我們目前所理解的臺灣社會是有所差距的。我們必須知道，國族主義是一套論述形構，它並不預設了獨立建國，它反而內含著衝突與矛盾，一旦將國族主義限縮在獨立建國此一選項之上，我們就無法細緻地理解臺灣國族主義／認同在之後國民黨威權時期（白色恐怖）、民主化時期或政黨輪替等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再形構過程。這不僅犯了她同樣批評上述三位學者的缺失，與之後的史實有所差異。同時，她所呈現的歷史觀仍是一種簡化的、連續性的演化論，亦即「種子說」，只不過這個種子並非眾家所論定的1920年代，而變成了戰後初期與二二八事件。

然而，歷史總是在連續與斷裂中擺盪，或如同蕭阿勤所表示的，過去的歷史事件總是有不同的詮釋與再建構的敘事面向。²⁷從這點來看，更可延伸出另一個理論關懷之間的差異——就是蕭阿勤對於「種子說」的否證。²⁸對於蕭阿勤而言，他定義下的臺灣國族主義則是在1980年代的反對運動時期才開始逐漸出現在公共領域之中，1920、1930年代的反抗運動其實並不具備民族主義的內涵，而是一種族群性的意涵，這兩者當中存在的是一種論述的跳躍，而非連續。²⁹這透露出政治／文化菁英對於集體記憶的再認同與再建構的篩選過程，因此它不是早已種下且逐漸成長的種子，而是刻意被培養的、強迫長大的植物。

這裡點出了一個癥結點，意即，「起源」的重要性究竟為何？「起源」的定

²⁶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386。

²⁷ 蕭阿勤，《回歸現實》，第一章。

²⁸ 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9、44。

²⁹ 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5；以及同頁註2引用John Breuilly的論點。

位並不是價值中立的，而它所引起的歷史／政治效應更不是中立的，這當中牽涉許多知識／政治／權力糾葛的問題。簡言之，我們需要重新概念化「起源」，「起源」不再是確切時間的考據證實，更重要的是論證「起源」與「現今」之間的接合關係，以王明珂的話來說，其實就是探討一種由「過去」到「現在」之間的延續與變遷，以及相關的一些「為何」與「如何」；也就是對「形成過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及其成因的探索。³⁰ 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在討論「歷史」時曾指出：

我們不只是一要「解釋」某件事是「從過去延續下來的」，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何它能延續下來」？³¹

我想陳翠蓮在這本著作中對於「解釋某件事是『從過去延續下來的』」詮釋的可以說是穩紮穩打，但對於「為何它能延續下來？」這個提問卻是力有未逮。

³⁰ 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關探討〉，《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 1 (2001年6月)，頁266。

³¹ C. Wright Mills 著，張君政、劉鈞佑譯，《社會學的想像》(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210。

引用書目

C. Wright Mills (著)、張君玫、劉鈺佑 (譯)

- 2006 《社會學的想像》。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方孝謙

- 2001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王明珂

- 2001 〈「起源」的魔力及相關探討〉，《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1): 261-267。

吳密察

- 2006 〈台灣國家認同之歷史回顧－日本時代：一個失敗的經驗〉，收於施正鋒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頁 161-169。臺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吳叡人

-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 2006 〈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 127-218。

李筱峯

- 1996 〈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收於張炎憲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 275-301。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柯裕棻

- 2006 〈去殖民與認同政治：訪談《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思想》2: 255-267。

陳翠蓮

- 2008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荊子馨 (著)、鄭力軒 (譯)

- 2006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蕭阿勤

- 1999 〈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3: 1-51。

- 2008 《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